

論 詶 布 爾 尔 什 維 克

成 功 的 基 本 條 件



新民主出版社發行

克維什爾布論
成功的基本條件
(本訂增)



新民主出版社發行

論布爾什維克
件條本基的功成

編印者

正報出版社

發行者

新民主出版社

承印者

嘉華印刷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定價港幣一元六角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版

一九四九年三月增訂再版

版權所有

2001-7000

目 錄

加強黨成為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代序）	方 方	（一）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斯列波夫	（九）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斯列波夫	（六）
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	中共中央宣傳部	（三）
「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列寧	（二六）
反對經驗主義	艾思奇	（三）
檢查執行程度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	真理報	（四八）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	蘇·朱可文	（三三）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伏蒂也娃	（六〇）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	（六九）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真理報	（七七）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陳伯達	（八三）

加強黨成爲統一的

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

——代序

我們的黨，從建立到現在，已經二十七個週年了，在這二十七個週年中，儘管敵人如何强大，革命鬥爭如何複雜、艱苦，我們黨終於領導着廣大的全國人民，渡過了無數的波折和難關，而走上了今日的面臨着全國革命澈底勝利的局面。

我們黨之所以有力量從若干困難和長期鬥爭中扭轉了中國革命的關鍵，使之走向面臨全國最後的澈底勝利的局面，是由於我們的黨，從建黨的第一天起，就是以正確的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來武裝我們的頭腦，來領導中國的革命鬥爭。

二十七年來，我們黨根據列寧同志的「政治是從聯系到千百萬人民利益的事情出發，是原則的從政治去對待問題」的教導，也即是毛澤東同志的「固鞏黨與羣衆的聯系」的一貫的思想原則與組織原

則，因此我們就能够依靠羣衆克服困難，渡過曲折，走上勝利。

大革命初期，我們黨幫助了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製定了反帝與反封的方針，訂定了聯俄與農工政策，因而爆發了全國性的「五卅」的反帝高潮，因而爆發了全國性的反封高潮，使國民革命能够順利的完成北伐。

大革命末期，由於國民黨內的新軍閥，背叛了孫中山先生手訂的方針與政策，勾結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反共反蘇，屠殺工農，我們黨秉承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光榮傳統，在農村中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的政府與人民的軍隊，保持了中國革命的主力，使不斷絕而且發展。

抗日初期，爲了挽救民族的危機，我們黨力爭停止內戰以共赴國難，西安釋蔣，把紅軍開赴敵後擔任最危險最艱鉅的戰鬥任務，停止沒收分配土地政策與建立工農兵政權，終之使八年抗戰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日寇投降，我黨爲着執行全國人民和平的迫切要求，毛主席親飛重慶，與蔣會談，委曲求全，終之奠定了政協的基礎，使獨裁者不得不在人民壓力面前簽下和平的條約。

美將勾結，棄義背信，發動全面新的內戰，我黨爲着捍衛和平，不得不嚴肅自衛，扭轉戰局，由防禦轉入進攻，推向全國勝利的澈底反對帝國主義，肅清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以實現中國

人民的最後澈底解放。

一十七年來，艱難困苦，迂迴曲折，而我們黨在領導上在一些時期還犯了一些錯誤，——甚至有時是嚴重的錯誤，但我們黨終之領導中國人民順利走向勝利，主要就是在於每個時期的方針、口號，能够堅持聯系千百萬人民的利益，堅持黨與羣衆的固連聯系這個原則。沒有了這，我們不僅不能勝利而且有被敵人消滅的可能。

因此，明顯的說，所謂政治上的原則性問題，就是廣大的羣衆利益問題。因此，明顯的說，目前我黨所提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問題，是二十七年來我黨的一貫的方針的繼續與發展。是關涉着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澈底解放問題，是廣大羣衆利益的原則性問題，儘管目前在執行這些鬥爭中（如土改）有若干偏向，也不能擴大這些偏向的嚴重性，也不能因這些偏向來懷疑我們的原則方針，修改我們的原則方針，相反的，是應適當的正視這些偏向，糾正這些偏向，使我們能更健全的依着我們的原則方針更邁步前進。

二

當然，我們黨之所以能够堅持千百萬人利益的原則性，是由於能够在不斷克服錯誤偏向中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們黨的發展與中國人民的不斷勝利，也可以說是從對缺點的不調和性的嚴肅鬥爭中發

展起來的。

大革命末期，我們黨如果不克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路線的機會主義，我們黨就不可能轉入農村，堅持農村的鬥爭，發展土地革命，以保存和發展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

內戰中期，我們黨如果不克服立三路線的冒險主義，我們黨就不可能在廣大農村中造成革命根據地，建立工農兵人民的民主政權與人民的部隊——紅軍，以粉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所組織的「五次圍剿」。

內戰後期，我們黨如果不克服「左」傾的機會主義，我們黨就不能勝利的長征，達到抗日戰爭的最前線，爭取和平，一致對日，把中華民族反對日寇的強吞硬佔的革命戰爭發展起來。

抗戰初期，我們黨如果不克服新的投降路線，我們黨就不能獨立自由的去實施民生改善與民主自由，發動羣衆的抗日積極性，擴大抗日武裝，建立敵後的抗日根據地，克服了投降危機，達到最後打垮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黨不僅對於這些大的原則性的錯誤，曾經毫不調和的予以鬥爭及克服，甚至即使是非原則性的錯誤缺點，我們黨也嚴肅的把它提高到原則問題上來警惕、來糾正，斷不讓它發展成爲大的錯誤，讓他潰爛成爲不治之症。中央五月廿五日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毛主席四月一日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任弼時同志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關於土地改革中的

幾個問題的講話，就是我黨對於一切錯誤缺點嚴肅的提高到原則性來檢討、來糾正的具體表現。

這就是說，二十七年來我黨對人民負責的真正嚴肅態度，是毫不苟且，毫不馬虎，堅持原則，修正錯誤，因此能够使我黨更加鞏固的與羣衆聯繫，更加獲得羣衆的信任與擁護，因此就有強大的力量足以戰勝敵人。

三

目前，我們黨已在擁有一萬萬六千萬人口並在某種程度上聯成一片的地區當政，隨着革命的繼續發展，我們黨將成為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因此，如何加強我們黨的整理，如何加強我們黨的集中的革命紀律，便具有頭等的決定的意義。（中央宣傳部指示）

二十七年來我們的黨，堅持了馬列主義的為人民服務的基本組織原則，也經過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在集中的革命紀律上，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團結和統一，這就是我們黨所以能有力領導四次革命戰爭勝利的最好說明。但是從今天黨要達到領導全國規模的勝利，以便更進一步的領導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就非比過去任何時期更提高真正鐵的紀律與取得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全心全意擁護不可。

過去我們黨的歷史，正如中宣部所說的，因為長時期處於農村分散環境，及因受戰爭的分割，因此不能不根據各方面的不同的敵情，不同的地形和政治經濟條件，給予各方面發展高度的地方性，發展高度的地方自治權，以克服當時複雜的困難，把中國革命推向了全國規模的勝利，這就是毛主席之所謂「承認山頭」的理由。但是，儘管在那裏的環境，那樣的做法中，黨也仍然不放棄對於地方主義與工作中的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作鬥爭，而且也教育每個同志必須有「拆散山頭」的精神準備。

今天，我們已經有聯成一片的地區，我們已經有鞏固的許多中小城市而且將要奪得更多的大中城市，我們將要成為全國性的人民民主政府的領導政黨，如果我們自己內部沒有統一的意志，統一的行動，統一的紀律，就不能去完成擴大而鞏固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就不可能克服統一戰線內部的各種動搖，就沒有辦法完成中國革命的澈底勝利。

因此，中宣部所指出的「要求我全黨全軍在一切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的政策完全統一，而行政制度與行政機構也要逐漸實行必要與可能的統一……」和中央五、廿五指示信第六項所指出的克服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和策略的錯誤態度，是一個異常正確的決定，一定能够為我們全黨全軍所熱烈擁護。這對於我們黨的歷史，將是空前未有的大踏步前進，對於中國革命在全國規模的澈底勝利以及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的各種建設，將獲得更大的保證與更遠的實現。

四

在蔣管區，我們的黨一面是處在農村分割的農民鬥爭與游擊戰爭環境，一面是處在荒淫無恥氣氛的城市的地下工作，因此對於爲人民服務的原則性，認真糾正錯誤的嚴肅性，肅清散漫自由的集中的紀律性，較之解放區的黨，又更爲迫切地需要整理。

一年來農村的農民鬥爭與游擊戰爭，固然有其偉大的成績不可否認。但有的玩弄暴動，不打好基礎準備好羣衆與幹部，而企圖以公開號召拉攏地方勢力攻佔城市，以致引起失敗，使幹部犧牲而羣衆受摧殘；有的自成一套的政策，打車打船妨害着正當的工商業的利益，征糧征借妨害着不反動的富戶的利益；有的不根據一切客觀條件，妄行決定進行土改，說上級批准我們也幹，不批准我們也幹，甚至侵犯着中農的利益與過份的打擊地主富農；至於地方主義的不照顧全局，不照顧別的地區、別的部門，無政府主義的貪污浪費，則更不斷的發現。這些，都不是善於對人民負責的嚴肅態度，都是違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的錯誤。

一年來若干城市工作，在敵人的瘋狂的白色恐怖之下，也有許多光輝的成績。但部份同志的自由散漫，不工作或很少工作，在等待革命勝利；部份同志風頭主義與唯利是圖，對於出版事業的缺乏計劃而相爭相奪，標榜刺激希奇名詞以牟利，不嚴肅對羣衆負責；部份同志貪逸樂、貪清閒，找舒適

「高尚」的職業而不願深入勞苦羣衆；部份同志的生活腐化，吊兒郎當的跳舞喝茶，上館子，搓麻雀；部份女同志的非因職務關係而不願育兒管家。這些，都是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都非我們高尚而寶貴的共產黨員所應有的思想與生活。

爲着保障蔣管區人民的生存，爲着迎接與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澈底解放全中國，爲着準備在全中國解放後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新建設，我們如不嚴肅的認識我們的錯誤與缺點，尋求犯錯誤的根源，急起直追的予以糾正，我們是無以擔當歷史所賦予的偉大的新任務的。

五

我們的黨，已經經歷了二十七年的艱苦鬥爭，已經領導中國革命走上了全國規模的勝利局面。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並有了自己領袖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黨，因此，要我們的黨提高到成爲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已經完全具備了一切必要的條件，只要我們不驕不躁，虛心學習，靠近人民，緊靠在毛澤東主義的旗幟下，不斷奮鬥，我們一定能完全保證取得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斯列波夫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堅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原則性的路線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治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民利益的事情出發的，是原則地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的。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是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什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他認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取同志意見的義務，但對於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他

顛倒過來」（列寧全集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并與反國家的傾向作鬥爭。每個工作人員底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當地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件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什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實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及「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發了。這些雜誌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報導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關係的，朋友的——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裂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加批評。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和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是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對人

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份落後的知識分子還沒有擺脫這個可恥的毛病。他們卑躬屈膝地與事實謀安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在於黨在當時所採取的或能够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與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人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的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思想的人，方能具有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從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為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上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會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為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曾頗中肯地講過：『那些沒

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六九〇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力的最重要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之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敗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為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的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果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麼便會給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就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斯那提煤礦」托拉斯和「卡堂也夫煤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報礦井中採煤量的事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共（布）黨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兩企業中領導者違反國家利益的行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地誠懇地指出他們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

於「用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三九八頁、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威信的損害，因而應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而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深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膽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上腐爛發霉，停止不前，那裡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如此的抱着不能容忍的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且竟然實際的就作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為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會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斯科——庫爾斯克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撤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職位，按她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她當總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的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睹，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